



城镇化纪事·发现村庄⑥



7月底,刘颜玲的大棚里依然积水,种植的青椒没等熟就已经死了,农场的工人正在拔除死秧。

# 一对城里夫妇抛家舍业进村办家庭农场,两年赔了上百万 流转了土地,却没转动市场

自己是保险公司的经理,丈夫办了一家驾校,全家一年收入五六十万元,这样的家庭条件足以让很多人羡慕,但滨州邹平县的刘颜玲却“一根筋”地舍弃了城里的事业,跑到农村种地。

刘颜玲通过土地流转雄心勃勃地包下村里300多亩地,办起了家庭农场,但两年多来她已经赔了上百万元。自然灾害、技术门槛、资金难题、市场困境,都成了她面前的拦路虎。在全省乃至全国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的大背景下,刘颜玲们面临的瓶颈亟待解决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

## 连日阴雨淹了大棚 忍痛舍弃大订单

7月底的一个下午,邹平县明集镇里六田村醴泉农场里,农场主刘颜玲刚搁下不久的电话又响了。河北一个客户想进一批蔬菜,有啥要啥。

可是,经过连日阴雨,农场60个大棚里还积着没脚脖的水,青椒基本全军覆没,只有几个大棚的茄子还能收获一些,但日采摘量也大大降低,根本凑不齐一车蔬菜,刘颜玲只好婉言谢绝了客户。

挂断电话,刘颜玲一刻也没有歇着,谢绝了远方的客户,她还得为自己的蔬菜在家门口找个“归宿”。超市、饭店、菜贩,一通电话打完半个下午就过去了。而类似的忙碌从每天一早就开始了。

这样的作息,对于2010年以前刘颜玲是不可想象的。那时她还是邹平县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,事业做得“风生水起”,和其他城里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,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和种地沾上边。

刘颜玲说,2010年以后丈夫做起了“农民梦”,一心想创办大农场,她也渐渐对办农场产生了兴趣,最终两人下定决心,把地点选在了里六田村。

说干就干,两人当即找到了村支书魏旭东,让他帮忙做村民工作。由于刘颜玲给的承包费超出了村民的想象,所以租地非常顺利。

刘颜玲最终以每亩地每年1500元的价格,承包了村里300多亩地,又从邻近的西左村租到40亩地,创办了一个占地360亩的农场,取名“山东醴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”。

农场建成了60个蔬菜大棚种植蔬菜,一个养殖园养殖家

禽,还引进了沼气杀虫灯、粘虫板等设备,在院内设置了扩音喇叭、监控摄像头、路灯,雇用了4名技术员、30多名村民。

按照刘颜玲的规划,农场在未来还要建一个蔬菜交易基地,3个养鱼池塘,要把农场打造成一个集观光旅游、有机蔬菜种植交易为一体的综合基地。

## 不打药不用肥, 蔬菜仍卖不出去

承包土地没有难住刘颜玲,办农场修理蔬菜大棚却让她实实在在地作了大难。“第一个难处就是技术问题,种地不难,但种好地太难了,而我俩基本都是外行。”

种植大棚蔬菜本来就是个难题,刘颜玲还想发展有机种植,“我们不用化肥,施肥全用牛粪猪粪等土大粪,除虫就用杀虫灯和粘虫板,少用甚至不用哪怕是低毒的农药。”这样更是加大了技术难度。

刘颜玲请来帮忙打理农场的,除了附近村的村民,大多是亲朋好友,对于种地他们不陌生,但蔬菜大棚、绿色有机农业却是个新鲜事物,各种新兴的农业机械更是难摸门道。农场购置的一台“食品安全检测仪”因为无人会用,至今还放在办公室里没有拆封。

而看不到的困难更可怕——农场面临蔬菜卖不出去的尴尬。59岁的村民邓建胜说,刘颜玲农场所外的沟里和空地里扔满了茄子,“卖不出去,都倒掉了,我们看着都觉得可惜。”

刘颜玲也说,市场是个大问题,有时“我看到自己种出来的蔬菜不是喜悦,而是难受。”虽然有西红柿、青椒、茄子、黄瓜4样蔬菜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,但由于蔬菜品相不好,消费者对农场的蔬菜并不感兴趣,“产量比普通种植方法低三

分之一,价格跟普通菜一个价还是卖不出去。”

经营农场两年多的时间,刘颜玲已经赔了100多万元,“要不是我爱人开着驾校,农场早就办不下去了,现在就是用驾校养着农场。”

## 效益低收益慢

## 银行不愿放贷款

在刘颜玲的老家,邹平县青阳镇刘家村也有一个农场,占地1000多亩,是刘颜玲农场面积的近3倍。这个农场背后有一个橡胶厂为其提供资金支持,但经理刘恒峰依然深感资金短缺的压力。

“说是搞现代农业,也只是把土地集中起来了,只能说是比以前进步了一点,算不上现代农业。”刘恒峰说,资金不到位,一些先进的农业设备就不能购置。

以农场的水利设施为例,现代化的规模农场,最好是配备“喷灌”或者“滴灌”设备,实现旱涝保收,但1000亩地的水利设施,这一套办下来就要2000万元,即使是铺设防渗管道也要500万,这对农场主来说几乎不可能独立办到。

刘颜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,农场先期投入的600来万已经花光了她家所有的积蓄,“由于效益低、收益慢,银行对农业项目不感兴趣,不愿意给我们提供贷款。”

因为资金不到位,刘颜玲规划中的蔬菜交易基地和垂钓池塘至今还是一个设想。

2013年年初,中央出台一号文件,明确指出支持家庭农场发展。5月份,山东省也出台了《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》,规定了申请登记家庭农场的条件,但对于如何支持农场发展的具体政策,各城市进度不一,大多数城市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。

“只说是登记,可登记之后对农场会有什么改变吗?”刘颜玲说,她最想得到的不是什么优惠政策,而是希望帮她协调一下银行,给她相应的贷款助她渡过难关。

## 拿不到承包费

## 村民心难安

在里六田村,村民们提起刘颜玲的农场,先是叹息,替她担心这样下去如何收场,接着是担忧拿不到应得的承包费。

“只要按时拿到土地承包费,农民就安心了。”魏旭东说,连续两年不能按时拿到承包费,村民们对刘颜玲的农场有些失望,特别是在有另外一个成功的土地流转的案例对比下,村民们的心理落差挺大。

邹平当地一个企业以每亩地每年850元的价格,在里六田村承包了40亩地搞鸭子养殖。“效益很好”,每年在到期之前,企业就会把承包费转到村里的账户。今年,在村干部的要求下,又把承包费每亩提高了400元,并拿出3万元帮村里搞公共设施建设。

“这样的流转,不论是干部还是村民,都欢迎,都放心,也愿意在用电、用水等方面提供便利。”魏旭东说。

相比较而言,刘颜玲的农场却不能让村民们安心,他们担心农场一直亏损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。拿不到土地承包费,村民们甚至产生过让刘颜玲退回土地的念头。

但就这么退出,刘颜玲显然不能甘心,她把希望寄托在了两件事情上,一是想办法筹集资金,把垂钓池塘和蔬菜交易基地建立起来,打开市场。二是想请一批农学院的研究生到农场里去,把农场当成实验基地,搞科研的同时,也为她提供一些技术支持,帮她把蔬菜产量、质量提上去。

记者观察

## 连片土地集中种 是未来趋势



农场雇用的工人在割韭菜。

其实不光“外来户”刘颜玲,里六田村村民孙学河也动过办农场的心思,为此他还动员儿子购买了深耕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水泵等大型农业机械。

所有的硬件设施都已具备,孙学河也向村里申请了多次,但集中大片土地的想法依然没有实现——村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不统一,有愿意也有不愿意的,这样承包到的地“东一块,西一块”,很难集中连片,不能机械化操作,种粮成本也降不下来。

为帮助孙学河集中土地,魏旭东也做了不少工作,甚至让他参加村委会会议,听村民代表的意见。魏旭东认为,孙学河承包不到大片土地的原因在于出的承包费不够高。“如果承包费合适,大家还是愿意的。”

“一亩地的承包费如果超过1000元,平时也可以去农场里打个零工,等于双份收入,挺合算的。”村民邓建胜说。

目前,像醴泉农场这样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在明集镇就有三四个,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农场、养殖场,全镇近7万亩土地,已经成功流转出了5000余亩。

“土地流转集中到少数种粮大户手中进行集中种植,这是未来必然的趋势。”魏旭东断言,现在这帮五六十岁的农民还有力气种地,再过10年他们不能种了,年轻人又不会种,势必会出现土地流转的高潮。

本报记者 张泰来